

2026年11月刊

布尔什维克月报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Большеви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布尔什维克》月报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Большевик

2026年11月刊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提纲

1. 反对劳动剥削和压迫！消灭过劳和低薪！必须大幅增加工人最低工资，且大幅减少工时至五天八小时以下。劳动权就是生存权！消灭失业，必须确保全民就业！
2. 争取工人阶级的组织权和罢工权！工人阶级有权且应当在各行各业创立战斗性工会，同一行业的失业工人和在职工人应都团结在同一工会之下。并且，这些战斗性工会应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团结起来，以罢工、建立纠察队、公开老板账本、建立工厂委员会民主控制劳动单位等阶级斗争方式反对各色压迫，争取和捍卫劳动权益、民主权利及社会福利。
3. 争取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工人必须拥有政治言论自由和出版工人刊物的自由，废除官僚的审查制度，实现内外网互通，劳动群众有权游行、抗议、结社，尤其是组建工人政党。
4. 反对针对女性、性少数、和少数民族的压迫与歧视！消灭由此产生的就业、薪资和民主权利上的不平等。家务和育儿应完全从由家庭负担转化为由社会公共服务全部承担。彻底捍卫少数民族和文化地区使用母语的权利。
5. 住房、公共交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如养老金）和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公共食堂，各类育儿、养老、文化机构等）全部由公共开支负担，对劳动群众全部免费，大幅且持续不断提升其规模和质量。
6. 清除并终结中国公共体系之内的所有腐败和特权！官僚的私人财产全部公示，贪污所得全部充公，不必赔偿。彻底清除公共体系中的官僚主义例如医阀、学阀等，在单位和行业内确立基层民主控制！所有管理者应由选举产生，其工资待遇不高于熟练工薪者的平均水平，且由选民随时监督和撤换不称职者。
7. 中国500强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GDP的四分之三。所有大公司中的私有部分以及中国的全部金融机构都应该被再次国有化，并被重新整合进由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的计划经济中。
8. 要解放中国就必须终结中国的资本主义。自由派兜售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样源源不断地产生腐败、压迫、剥削和战争。中国工人阶级应在所有层面树立工人民主控制及管理，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国工人国家，杜绝其中出现享有特权的官僚。
9. 由劳动群众民选出代表组成中国新的最高权力机关，对所有代表同样实行普选制和随时撤换制，其工资待遇同样不得高于熟练工薪者的平均水平。如列宁所说，每一位劳动者都要接受从事政府行政工作的训练，最终由劳动者们轮流在地方社区执行行政事务。
1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政权不能被困于一国。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积极推动和支援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夺权建立工人政府。国际无产阶级一同建设世界社会主义联邦！

我们是谁？

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的时代，亦是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时代。能够更换天地的工人阶级力量，唯有匹配上最能引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才能终结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带来社会主义的新生！

要建立先锋队，首先要抓紧理论斗争。《布尔什维克》旨在传播分享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致力于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阶级斗争的理论参考点，成为激进层、工人阶级乃至劳苦大众眼中解放社会的可见纲领和指针！

革命理论的传播需要更多的助力，如你也是同志，请联系我们、订阅《布尔什维克》月报、将我们的文章和频道转发给更多的左翼群体！或者向我们投稿！

我们的刊物

日常更新，请见

- 官方网站：https://bolshevik.red/
- 电报频道：https://t.me/bolshevik_red
- 推特频道：https://x.com/bolshevik_red?s=11

深度理论探讨，请见我们的杂志：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封面见右侧）

我们翻译的书籍：《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

联系我们！

联系与投稿邮箱：bolsheviks.red@proton.me

月报订阅邮箱：bolsheviks.sub@proton.me

订阅方法：向订阅邮箱发送任意内容邮件，亦可通过本刊电报和推特频道下载。

转载须知：

我们的内容开放给所有读者转载或使用。转载或使用时，请务必注明内容源自《布尔什维克》网站。但转载或使用时，若您对我们的内容做出删减或修改，我们将不对修改后的内容和立场负责。



目录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提纲
信息页

原创

1. 社论 7
2. 对强制缴纳社保的愤怒显示工人阶级对未来希望渺茫 13
3. “演都不演了”的文吉儿：一场争议撕开了官僚权贵的遮羞布 19
4. 卢德主义重返？——技术焦虑背后的阶级问题 23
5. 什么是AI？它会产生意识吗？ 27
6. 皇汉从何而来：资本主义重建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衰 35

转载

7. 黄仁勋的回归 49
8. 黄仁勋的兴衰 53

专栏

9. 阶级斗争专题：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61
10. 共产主义问答：欧洲福利体系现状如何？ 65

社论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2026年11月可谓全球股市的多事之秋。西方AI产业链的几场大戏，从黄仁勋的去留到Anthropic的上市，都让全球股民战战兢兢。这轮抛售潮也波及了中国股市，对中国经济的质疑随之增多，甚至让官媒正气凛然地发表了一篇题为《唱空中国经济者终会落空！》的文章，替中国资本主义搞起了“战狼外交”。

当然，资本主义中国这个月也确实有些进展。作为今年APEC东道主，中国在科技之城深圳接待了多国政要和领导人，并举行了看似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俄美三国元首会晤。前来参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伊朗战争的烂摊子至今收拾不了，日前又在中期选举中遭到重挫，成了妥妥的“跛脚总统”。他在APEC会上还试图拉着习近平的手上扶梯，好不甜蜜。

同时，10吨级电动商用飞机CE-25A有人驾驶首飞成功、小鹏汇天A868电动飞行汽车试飞成功等新闻，继续为中国不断推动科技发展的主旋律增添音符。

这一切都让《人民日报》笔杆子们的断言看似有几分底气。

然而，在光鲜亮丽的表面之下，是《人民日报》企图否认、却在不断加深的生产过剩危机及其后果。

这首先表现为消费依然低迷、内需依然不足。

过去两个月，我们先后经历了国庆七天长假和“双十一”购物节，这本该是群众集中消费的时节。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包含国庆黄金周在内的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4%；就连一向被当作亮点的服务消费也在降温，今年前十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仅增长4.9%，比前三季度的5.0%还有所回落。荷兰国际集团（ING）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也写道，2026年是近年来内需最疲弱的年份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出口增长等亮眼数字，显然都没有转化为国内群众的工资和购买力。

“K型经济”同样是中国乃至全球群众热议的关键词。《人民日报》9月还专门发表评论，声称用“K型分化”描述中国经济“至少存在三个偏差”。然而，就连拥护资本主义的保皇自由派媒体《财新》都不得不对此进行报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军扩在接受《财新》采访时，一方面表示“K型分化本身并不是问题，也谈不上好坏”，另一方面却又承认：

“但由此产生的两大影响会对经济稳定运行形成真正的挑战。第一大影响是结构矛盾演化为总量矛盾，局部需求收缩导致总供求的失衡；第二大影响是发展分化导致就业和收入的分化，以及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矛盾。

他称，尽管当前的问题是阶段性的，根源是阶段性的、结构性的，但在市场经济下，这些问题都不会局限于静态，有可能会依托市场预期和主体行为的反馈，通过‘需求收缩—收入增速放缓—财富效应减弱—消费和投资能力、信心进一步下降’这样的链条，形成不良循环。而这种不良循环一旦形成，又会带来新的结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则把这种不良循环称为“看不见的市场失灵”，并承认在需求不足的负向循环中，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结果是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这两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实际上都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阐明的、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生产过剩危机：在生产中被榨取剩余价值的工人，无法买回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这也不是靠政策就能根除的，它反映的是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新的社会制度才能释放出来。

当然，中共会像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企图通过举债和经济刺激政策等手段来提振消费、缓解危机。但从目前来看，今年以来出台的各项政策收效甚微。

生活在这样的经济现实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就算可能认可中国在科技和国际地位上的提升，或者觉得国内环境并不比国外糟糕，内心也必然充满焦虑和不安。这些焦虑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本月我们《布尔什维克》杂志着重分析和对其提出解答的主要对象。

首先，由于计划经济的瓦解，中国的各项福利保障持续恶化，其中社保尤其得不到工人阶级的信任。2026年11月1日起，企业欠缴社保最高可被罚款三倍。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引发了相当广泛的不满。帕里斯·蒙克同志对此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工人们已经认识到：“在绝大多数工人如今的工资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强制缴纳社保实际上是政府与工人争抢生活必要的花费，而不是帮助他们‘投资’未来。”

另一方面，某些高高在上的名流的恶劣行径，也可能触发群众对统治阶级嚣张跋扈和官僚作风的积怨。作家文吉儿近来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引发热议，网友随后又翻出她过去在另一档综艺中公然炫耀自己“人脉跟资源”的片段，讨论随之愈演愈烈，就是一例。Kuno同志在对此事件的评论中观察到了网友讨论风向的转变：“一开始，网友们对于文吉儿的讨论可能还停留在她的个人道德层面上。直到发现她过往充斥着中共统治阶级的特权，这把怒火开始燃烧并蔓延开来，对个人的质疑转变为对体制的质疑。”

当然，如今全世界每个人的生活都已经离不开AI的发展。但这种飞跃式的技术创新，给不同阶级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对于绝

大多数工人和青年来说，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AI与自动化正在迅速剥夺他们的生计。AI是否会产生意识、进而主宰人类，也是千千万万人正在忧心忡忡地琢磨的问题。

对此，明太鱼和喀秋莎同志们的文章《什么是AI？它会产生意识吗？》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重新阐释了什么是人类意识，并阐明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区别。厘清这些重要的哲学概念，不仅能让革命者避免陷入无谓的绝望，也能提升我们今后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各种新进展的能力。

不仅如此，我们也认识到，社会上对AI的普遍焦虑，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劳动者异化的现实。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在这种社会里，“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正因如此，许多人才会担心自己终将被人类创造的机器所支配。

围绕AI的另一个相关争论，是技术发展本身是否应该被反对，由此也引发了对卢德主义及其当代表现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卢德主义者。我们认为，需要改变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同时，历史上的卢德运动也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当年参与运动的工人虽然路线错误，却表现出了过人的斗争勇气。魏希醍同志的分析文章《卢德主义重返？——技术焦虑背后的阶级问题》简明地回顾了这段历史经验。

当然，更重要的历史经验则在于学习工人阶级是如何在斗争过程中学习并将自己组织起来的。正因如此，我们选择本月《布》阶级斗争专题为工会问题，以马克思的重要文章《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来让读者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分析工会运动和策略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明白，社会危机的加深也会表现为群众意识向左和向右的两极分化。但具体来说，由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巨大分量，大多数工人和青年的意识会向左转、朝革命思想靠拢，只有少数人会到右翼那里寻找答案。在中国互联网上，公

共讨论空间受到中共波拿巴主义独裁国家的严厉打压、审查和扭曲，似乎只有拥护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言论才能被容忍。

但就连国家不容许的、更加极端的反动言论，比如所谓的“皇汉”，似乎也能在互联网上见到。这是否就代表中国群众的意识正在朝反动方向发展呢？洪专同志执笔的重磅理论文章《皇汉从何而来：资本主义重建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衰》把这股风潮放到中国资本主义重建以来的各种社会进程中加以辩证分析，并解释了为什么它并不能代表中国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与从欧洲、拉美到突尼斯、孟加拉国等爆发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众多国家相比，中国国内局势仍然相对稳定，群众的意识也还没有发展到大批走上街头的程度。我们坚信，中国内部发生这样的变化，是未来必然会到来的事情。但我们也必须清楚，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

实际上，1873年的德国资本主义和当今的中国资本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些类似：当时的德国刚刚完成统一，正经历着一轮工业高速扩张和投机狂热。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是这样观察的：

>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况且，虽然现在的斗争浪潮确实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众的愤怒已经不存在。甚至仍有个别勇敢的人挺身而出，奋起抗争。

11月9日上午，西安西咸新区一名胡姓男子，独自开着挖掘机冲击了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据当地管委会工作人员说，他是因为不满养殖场的拆迁赔偿，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另有报道称，他此前曾多次上访无果。网上也有爆料称，此事牵涉工程欠薪或欠款问题，涉及金额高达2000万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愤怒并不是孤立的。即使现在还没有爆发出来，这种愤怒的火种也已经深埋在每一个中国工人和青年心中。有些人已经到了怒火中烧的地步，其他人终将跟上。

马克思曾把革命比作一只不停挖掘的“老田鼠”。但如今挖掘着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已经不再是一只田鼠，而是一台挖掘机。它会一直挖下去，直到《人民日报》的笔杆子们、他们的主子们，以及他们所捍卫的资本主义制度统统“落空”为止。

对强制缴纳社保的愤怒显示工人阶级对未来希望渺茫

帕里斯·蒙克

从2026年9月1日开始，中国政府强制要求所有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也就是由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组成的“五险”），11月更追加颁布不交社保的罚款裁量基准。

这看似是在捍卫工人阶级未来福利的举动，实际上凸显了中国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重大矛盾。

说是爱你，其实害你的社保制度

一直以来，中国工人的收入都在维持个人温饱的水平上挣扎，主动放弃由公司和个人共同缴纳社保，改为公司直接发放一笔现金，是一个无奈但现实的选择。毕竟，如果就连房租水电都付不起，那么怎么还会有余裕考虑养老、失业或工伤的问题呢？

显而易见，企业自然不会因为这条规定就上调工资，确保工人实际到手薪资和之前不变。老板们反而会摊开手说：“我们也很无奈！这可是国家的强制要求！”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强制缴纳社保的结果，就是强行从工人现有的工资中夺走一部分，或是干脆促使企业直接裁

员降本。举例来说，根据新规下北京市社保基数及缴费计算，一名原本不交社保的情况下月薪为4000元的工人，如今到手的工资将会只有3233元。

中共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现实。面向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直接承认：

> “网络上也有不少声音担心该司法解释的施行会使得企业面临成本压力，从而导致其有减小投资规模、裁减员工的倾向。”

对此，他们只提供一些含糊不清的补贴，保费申请方案外，还对着工人们说教：这条规定实际上是为了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保护工人，“推动我国劳动体系向更加规范、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至于之前主动放弃社保的行为，则是工人短视、贪婪的后果。

一位网友讽刺地提问戳破了政府伪善的嘴脸：“能不能现在每个月发给我1500，我63岁以后每月给国家退休金行吗？”没错，在绝大多数工人如今的工资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强制缴纳社保实际上是政府与工人争抢生活必要的花费，而不是帮助他们“投资”未来。

要理解中共政府为什么要在如此巨大的阶级压力下仍然一意孤行，我们要理解中国资本主义和政府财政的困境。

不可避免的矛盾加大

当前社保危机的源头是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自从改开重建了资本主义以来，中国企业一直通过高度剥削压低成本维持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意味着工人们除了基础的衣食住行可以勉强满足，工人阶级的一般工资水平无法承担更长远的生活规划，无论是生育还是未来的养老。根据厦门大学经济研究院所发表的《中国家庭财富与消费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年收入低于30万的群体中高于50%的借贷都用于生活开支和医疗健康等消费。

这种现象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恶化时期的青年工人来说尤为普遍，尼尔森 2019 年《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高达86.6%的年轻人都在借钱度日，这个数据近来已经比较难找，但年轻人仍然需要负债来支撑生活仍然相当常见。

与之相对的是企业严重“内卷”。

近年的生产过剩危机使企业陷入更加恶性的价格竞争，在“降本增效”打赢价格战的过程中，毫无组织的工人阶级当然成为了首先可以牺牲的被剥削原料。这进一步让工人工资水平整体恶化。

在企业争相拉低生产成本的背景下，指望它们主动提高工资抵消社保新规的影响定然是一种奢望。在当下强征社保必然是一场工人和政府的零和游戏，于是它无比尖锐的突出了中共政府的资产阶级丑恶面目——宁可盘剥工人、不肯伤害资本家一分。

一位网友的评论精确道出了中共政府的本质：“你如果强制缴纳社保+强制落实8小时工作制+强制月休不少于8天+严厉惩处拖欠工资和裁员赔偿，我会认为你不忘初心。但你只提了强制缴纳社保，那我觉得你只是缺钱花而已。”

缺钱花的政府

1980年，中国实行了“一胎政策”以降低当时政府教育、医疗等福利支出，但这个短视的政策也导致了如今严重的老龄化危机。养老金，这个社会保险基金中的大头支出，依赖于当下仍在工作的工人阶级上缴社保以维持发放。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主要人口构成是仍在工作年龄的工人阶级时，养老金基金仍有结余，但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日益深重，养老金日益成为中国政府的心头大患。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估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压力会导致中国年GDP增长在2024年到2050年期间降低2%，并使养老金占GDP比重增加将近10%。支取的养老金显著多于上缴的养老保险，社科院估计2035年中国养老金结余将彻底耗尽。

面对入不敷出的未来，中共政府慌忙“开源节流”：一方面强征社保，逼迫工人阶级将手中的钱存到社保中充盈养老金；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年龄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

于是，工人阶级就这样被强迫将手上的钱交到越来越遥远的退休中。资产阶级最忠诚的专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盛赞：中国的GDP增长由此可以每年提高0.2%！ 很明显，中共政府坚定站在资本家一边，通过对工人生活水平重拳出击来为“国民经济”（资本主义）注入活力。

这一切又是在最难以忍受的官僚主义和肮脏的官商勾结下进行的。

由于社保缴费有基数下限，也就是说哪怕工资低于最低基数也按照该工资标准缴费，所以工资越低的工人受到强征社保的打击越大（以北京政府规定为例，3000月薪得交将近三分之一，月薪10000则到手工资8300元，缴费少于五分之一）。资产阶级政府当然“体贴”地为工人着想——许多地方政府联合银行推出“社保贷”，让“灵活就业”（失业零工）和低收入工人贷款缴纳社保，等退休后再用养老金还款！如果资本主义对工人来说是无尽的恐怖，那么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无尽的美妙——美妙的赚钱机会！

工人阶级早已被剥夺未来

对于强征社保的愤怒不仅是对于工资被政府强行收缴的不满，更反映了工人阶级广泛的对社会前景的不信任——如果就连眼前的生活都在持续的危机下朝不保夕，那怎么可能通过上缴社保获得一个可以安享的晚年呢？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提问：难道现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如此之低下，必须要盘剥收入最低的工人才能勉强提供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的保障吗？

答案显然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与工人生活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简单举例来说，中国2013-2022年培养了约860万医学生，但医生总数仅增长76万，中国不缺少能做医生的人，而是为医生提供生活保障的医疗支出；中国空置房屋在6500万至8000万套之间，一位前政府官员表示“14亿人都住不完”。

我们缺少的并不是生产出这些资源的生产力，而是一种能合理分配这些资源的经济体制。

而在资本主义下，就连社会保障本身也能成为金融家盈利的工具，大众的基本需要和资本的利润导向越来越在扭曲的体制下尖锐对立。正是在这个事件中意识到了资本主义下没有未来的可能，中国青年和工人的意识正在急剧达成更加激进的结论。

而只有以计划经济取代利润主导的资本主义，以工人民主控制的政府和经济取代官僚集权支持的资本主义，才能真正消灭资本主义下私人利润和社会需求的矛盾，为工人阶级构建一个得以有尊严生活的未来。

“演都不演了”的文吉儿：一场争议撕开了官僚权贵的遮羞布

Kuno

最近，在综艺《后会友期》里因与前好友的感情纠葛，作家文吉儿被广泛不喜和议论。

起始于厌恶她的斤斤计较和咄咄逼人到近似霸凌的行为，网友开始关注她的生平往事，。在过去的另一档综艺里，作为素人的她曾嚣张地对一位大老板直言：**“我在湖南有的人脉跟资源，绝对是您意想不到的。”**这就更令网友好奇她的底气何在，开始深挖。

原来，她疑似是两位湖南官员之女。网传，她的父亲是文广平，曾在湖南株洲担任政府部门领导职务，包括株洲市城管局副局长等，后来又有天津市南开区委办公室任职的说法。她的母亲则可能是曾任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副县长夏可珍。虽尚未有得到官方确认，但比起她父母是谁，其实文吉儿的个人履历，更能说明她一路享受到的特权优待。

她16岁进中国作家协会，17岁在报喜鸟新锐艺术人物文学类比赛打败韩寒、唐家三少、辛夷坞等作家，奖金高达30万元。18岁出版书籍《别让梦想只是梦想》，聚焦社会小人物——教师、学生、公务员等普通人追梦路程（权贵的儿女写普通人的梦

想，这是如此的讽刺），书评推荐人竟都是国家上将，少将，全国政协常委等等各种中共高官领导。网友评价说，“这些人的名字我都不敢念出来。”

那么，这履历背后，她到底是凭才华前进，还是借特权飞升？她的作品在豆瓣上最高不过4.9分，最低至2.6分。显然，这位作家的才华要么过于小众，要么并不存在。作品这样拉跨，作者却为何能获得密集的媒体曝光、文学组织身份、商业奖项和文化平台机会 ？大概就是她那在湖南很硬的人脉。

根据报道，文吉儿的母亲2020年曾任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新时代文创基金主任，这一头衔2024年被戴在了文吉儿身上，观感上活脱脱的女承母业。该基金直接是文吉儿的剧集的出品方或支持单位。但讽刺的是，夏可珍还出版过关于中共党员作风的书籍。从国家公益艺术研究基金会里的钱运进自己荷包这件事，被这群腐朽的中国权贵玩得明明白白。而现在，讨论文吉儿和她妈妈作为基金会主任这件事已几乎被全网清空。

如果再向早去追溯，网友还发现文考上中南大学疑似也借了贵为同校博士研究生的母亲的光，走了多重后门。还有其他网友爆料她在综艺上的霸凌做派，也曾被用在她曾经的好友同学身上逼其退学。

面对新综艺的争议，网友还发现她竟然能左右湖南台的剪辑，曾经一些在节目里不利于她名声的表现被重新删改。一整个综艺到电视台都向这位中共官老爷的女儿让步。

这些权贵透过贪污中饱私囊，利用特权调配资源来服务于自己的财富积累，再用特权和贪污为子女的飞升铺路，将搜刮的民脂民膏传承给自己后代。这背后终是在吸食工人阶级的血肉，以压迫劳苦大众来达成。

对比特权者的丝滑成功，无产阶级所遭遇的又是什么呢？作为学生，面对的是校园霸凌、暗无天日的学习生活、无助的未来。作为成年人，是日复一日地为资本家上班和加班、工人间的内卷，可怜的工资、老板颐指气使的剥削压迫、永远还不完的车贷房贷、等等。对比起统治阶级的生活，我们不用去想象地狱，因为他们已经为我们在人间给我们创造了地狱。

凭什么无产阶级创造了社会的价值和财富，但却不拥有它们。甚至在休息时候还要看到权贵的儿女在电视上大谈特谈，“演都不演了”地炫耀自己无比顺畅和奢华的人生——这当然是从工人们那里偷来的。

这些吸食着无产阶级血汗的权贵啊，实在是离无产阶级的生活太远了，甚至远到都忘记去掩盖自己财产来源的不正当，更忘了曾经无产阶级革命如何把资本家吊死在路灯上。

一开始，网友们对于文吉儿的讨论可能还停留在她的个人道德层面上。直到发现她过往充斥着中共统治阶级的特权，这把怒火开始燃烧并蔓延开来，对个人的质疑转变为对体制的质疑。

如果在10年前，面对这样的新闻，或许很多网友还怀有着对中共基本的信任，普遍觉得扫黑除恶和反贪反腐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认为这些嚣张行径只是一些即将落马的权贵最后的猖狂罢了。但如此多年的反贪腐和反黑恶势力，被证明只是当局官僚借着人民和正义的名义扫除自己的反对派，巩固自己的权力。

反过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加深，权贵老爷和劳苦大众的对立日益不能被掩盖，工人们的阶级意识也在不断地加强，对中共波拿巴和资本家不满也逐渐加强。中共经典的转移矛盾的手法也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使用中被工人所识破。中国无产阶级真正的敌人是可恶的资本家和官商勾结的官僚，更是腐朽无比的资本主义制度！

卢德主义重返？——技术焦虑背后的阶级问题

魏希醒

据《财富》杂志报道，今年4月的一项调查显示，29%的欧美知识工人正蓄意破坏其公司的AI战略——在“Z世代”（97后）的青年工人中，这个数字高达44%。抵制、假装使用AI或者故意用AI产出低质量产品成为了劳动者日常反抗的常见战术。同时，近年来中美都出现了工人向工厂、仓库纵火抗议的事件。

正因如此，关于“新卢德主义”的热议也一样在蔓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正经历一场“新卢德主义”运动吗？

历史上的卢德主义

狭义上的卢德主义（Luddism）运动指的是1811-1812年间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爆发的捣毁机器运动，其余波持续到1816年。1811年的经济萧条为工业革命下本已高度紧张的劳资关系雪上加霜。在与雇主针对工资、劳动条件和机器运用的谈判破裂后，首先是诺丁汉周边的织袜工，然后是棉纺和剪毛工人发动了暴动。

这些所谓“卢德分子”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发动运动的中部织袜工主要的诉求是提高工资，棉纺、剪毛工人则要求阻止新式机器的采用。为了平息这场运动，英国政府动用了12000名士兵进

行镇压，但诺丁汉和约克夏的资本家也被迫做出了工人要求的让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鲁德指出，“卢德分子取得的成功要归功于其极其灵活的战术，高度发达的组织，[…]最重要的是他们所享有的广泛公众同情。”[1]

如鲁德和霍布斯鲍姆所指出，卢德主义根植于英国18-19世纪间盛行的破坏机器传统。在这一时期，“借由暴动来集体协商”是英国劳工运动最重要和有效的武器之一。1910-20年代的早期中国工运（特别是在上海棉纺业）中，“打厂”暴动也是常见的斗争方式。[2]

那当前的现象又代表什么?

在今天的“新卢德运动”中，除了“八百哥”、金佰利纵火这样的个例，工人的行动通常是微观层面上的和平抵制。这些个体行动面临的是过去卢德主义工人也面临的问题：技术迭代和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结社权、罢工权等民主权利被腐蚀或剥夺限制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手段。更甚，在以“灵活就业”或“零工经济”为幌子的攻击下，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其中不乏过去的白领知识分子阶层）在劳动条件上也在接近工业革命早期衰亡中的手工业工匠，同时丧失劳动者的自主性和生计保障。

在过去，破坏机器是工人向资本家施加压力的手段；“新卢德运动”暂且不具备这样的集体行动能力。它揭露的是过去几十年来有组织劳工运动经受了巨大失败后，积压的阶级不满在重新寻找出路。和历史上的卢德运动类似，我们可以在“新卢德主义”中看到各种各样的诉求：从避免被AI“蒸馏”、反对修建数据中心到和新技术没有明显联系的阶级愤怒表达。

当代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权利的恶化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正借用起十九世纪初工人运动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这是工人运动的挑战，但也是机遇。我们不应忘记，卢德主义的时代同样也是雅各宾激进派、地下工会分子、欧文派社会主义者和宪章党人前仆后继的革命年代，“英国历史上再没有这样时期，平民百姓是如此持久、深刻，往往是奋不顾身的不满。”[3]

当时在约克夏的卢德派运动者，甚至呼吁群众效仿不久前的欧洲革命浪潮：

> “亲爱的父老们，请你们拿着武器站出来，帮助纠正者平反冤屈，甩掉一个傻老头子乔治三世、他更傻的儿子和他们的流氓大臣的可恶枷锁。所有贵族和暴君都必须被打倒。来吧，让我们效仿巴黎勇敢的公民的崇高榜样，他们面对三万暴政士兵，但还是将暴君彻底拉下了马。”

在资本主义危机和自动化的双重压力下，工人阶级各部门、各阶层间的隔阂正愈发丧失其物质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道理——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下“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对于今天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变成赤裸裸的现实。这些有利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物质条件已经开始在反应在阶级意识的成长上。现代工人们开始拾起了卢德主义的勇气，日后他们势必会拾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注释

[1]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0-1848* (Serif, 2005), p. 79-92.

[2]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7-192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 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Penguin Books, 1999), p. 51.

什么是AI？它会产生意识吗？

明太鱼 & 喀秋莎

在2026年9月9日Open AI宣布，他们的模型在数学领域突破了人类迄今为止都未能破解的难题：纳维斯托克斯千年难题。于此近乎同一时间，雅克布·考克森断言：

> “我认为AI最可怕的在于它可以自己让自己变得甚至更智能……你可以让AI去自己研究自己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会出现真正的“智能爆炸”。”

乍一看，AI解决数学问题的再加上考克森的这番言论，仿佛预示着AI将自己发展智力，自己主动学习，自己解决问题，从而完全地取代人类。

然而，这样的情况真的会发生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人工智能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它大概的发展过程。

什么是AI？

我们先从客观的角度去考察AI是如何发展至今的。

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与过去的人工智能相比有很大的进步。过去的AI完全依赖于人类预先编写的程序和规则，需要人类明确设定判断条件，AI则据此判断信息是否符合条

件。这种AI只能完成特定领域的自动化，其应用范围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十分有限。

后来随着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发展，人工智能开始摆脱对人工编写规则的完全依赖。算力得到了爆发，基于向计算机提供的大量数据，AI可以从中发现简单的规律。这些技术的计算大多是孤立的，因此只能完成一些简单任务。

而当今的AI快速发展则是得益于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技术。深度学习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由多层计算结构组成的机器学习方法。一系列计算层相互连接，每层都会对输入的数据进行计算和特征提取，并将算出的结果传导给下一层，让每一层之间算出的数据发生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计算的结果就被联系了起来，整个计算结构也不断调整内部参数，使得整个网络能够逐渐学习**数据中**复杂的特质和结构，其预测和处理人类给定任务的能力也就随之提升。

由于这一计算结构一定程度上那模仿了动物的神经网络，因此被称为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所使用的Ttransformer这一神经网络架构，它因其出色的查找上下文能力和统计复杂关系的能力被广泛使用在自然语言处理和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

然而到这里，搭建好了基本的神经网络架构只是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的第一步，AI此时还不能被直接使用。这时，人类就必须给模型提供**大量**数据，让它反复学习数据中的模式。在预训练（Pre-training）阶段，模型通过反复学习文本中的语言结构、语义关系和知识模式，不断调整自身参数，逐步提高对数据的预测能力。对于大语言模型而言，其核心训练目标通常是根据已经出现的文本内容，预测下一个词元（Token）出现的概率，并通过反复训练形成复杂的语言建模能力。

在预训练之后，人类这个时候还需要通过监督微调（Supervised Fine-tuning）、人类偏好反馈（Human Feedback）以及其他后训练方法，进一步调整模型的回答方式，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指令、需求和价值偏好。

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人类所开发出来的人工智能，是一类利数学模型学习海量数据中复杂的统计关系、执行任务来服务于人类需求的技术。

自2022年ChatGPT发布以来，各类AI模型的成功都来源于神经网络规模定律和大语言模型（LLM）。研究人员在2010年就发现：与其创新架构或者算法，指数级别扩大模型规模和训练数据量，就可以稳步提升机器学习的性能。当今的AI进步的基石便是这些十倍，百倍，千倍的数据量。

事实上，纳维斯托克斯千年难题的解决并非由AI凭空创造。其实是西班牙数学家科尔多瓦、路易斯• 马丁内斯• 佐罗亚、Fan Zheng 在2023年提出的数学研究路线，为后续利用AI实现的突破提供了重要的原创性基础 。AI 的作用仅在于帮助研究者推进、组合和完成这些构造，并利用大规模计算及形式化验证辅助证明。

这一切揭露了一个事实，AI并不能替代人类。AI之所以那么强大，在于它拥有人类开发的计算器的算力。而它之所以能回答许多领域的问题，恰恰是因为人类正在用自己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训练它。举例来说，DeepSeek-V3预训练就使用了约 14.8万亿（14.8 trillion）Token，涵盖互联网文本、数学、编程和多语言资料。Anthropic曾表示，训练Claude需要数万亿级别的文字Token。目前世界主要AI企业训练的大语言模型，训练数据规模已经普遍达到数万亿Token，有些甚至超过十万亿。

人类的意识是怎么来的?

而种基于数据和神经网络规模定律构建的技术产品真的可以萌生意识吗？那我们首先要问，人类的意识是从哪里来的？

意识是人类整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对抗中发展起来。它并不是对立于物质世界的超自然存在，而恰恰是物质运动的结果。

在哲学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明确指出，

> “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物理世界在心理的东西出现以前就已

> 存在，心理的东西是最高形式的有机物质的最高产物。……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

科学研究同样论证了意识的物质基础。2013年，科学家George A Mashour和Michael T Alkire在他们的论文中就指出,支持人类意识的基本神经生理机制具有古老的脊椎动物演化基础。

而关于人脑的由来，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写道：

> “劳动首先，其次是语言，后来又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

2015年，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报告，肯尼亚西图尔卡纳地区发现了**距今约330万年**的石器遗址，比目前已知最早的人属（Homo）化石早约50万年。这就证明了制造石器的劳动行为的出现，早于智人的出现。

而意识自出现后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晰揭示了劳动如何刺激人脑的发展：“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E·赫克特的相关科学研究已经发现，在个体层面，劳动会引起大脑的物质性变化。他的另一项研究则证明，这种神经系统的又影响个体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文化技能的能力 。而从整个种群演进的历史角度来看人类整体意识如何发展得更复杂，刘易斯·G·迪恩等人的相关论文《人类累积文化：比较视角》指出：“人类的累积文化将文化知识的高保真传承与有益的改良相结合，从而在技术复杂性上产生一种“递进效应”，最终催生出远比单个个体独自发明所能达到的更为复杂的特性。”

显然，一系列的科学研究证明了唯物辩证法能够正确认识人类意识发展上的总体轨迹。从人猿为了迁徙第一次双脚站在地面上，再到造出航天火箭，**人类**在符合自身生存目的无穷无尽的劳动过程中，得以增强自己理解世界并最终改造世界的能力，其意识自然也发展得更为高级复杂。

而这种意识反过来对人类又意味着什么？马克思指出：和动物有别的是，“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即人类不是和动物一般无意识地完成生存过程，而是能够反观自己的生命活动，**为其设置目的，并依据自己的目的改造现实**。劳动使人类产生了意识，但自此之后人类的目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辩证性地互相生成彼此，相辅相成。

AI的模仿同人类意识的区别

很多人惊讶于AI个体超强的信息储存和计算能力，因而以为仅凭这项超能力AI就可以发展出意识。但却忽略了从根本上来说人意识的具体产生过程，和人的意识远比记忆和计算更为复杂，且人类的意识不是个体产物，而是一种社会性产物。

人类整个种群为了生存不得不持续适应、利用、开发物质世界。这种同自然界的交互是人类劳动和意识发展的基础，这使得这个过程具备内在的动力，可以不断地展开自身。我们再回看AI， 它是否能过透过和物质世界的交流而自发地刺激自己产生新需求，自发组织尝试和物质世界的交互因而自行推动自己的发展？当我们回看这项技术的发展历史，显然并不是。

从一开始，这项技术的进步就是必须要由人类先来开启，并最终服务人类的需求。今日它不过是发展得更为复杂高级罢了。AI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模型和算法，必须被动地等着人类喂给它一堆组数据，赋予它一个目的，否则它就都不会启动。AI也从未自主地和物质世界交互过，智能体们的交互也不过是局限于计算机的虚拟世界中，最终服务于AI和人的交互。哪怕人类仅仅是捡起一块石头想着用它来做点什么，这对于AI来说都是不能完成的神迹。

其次是人类的意识远比记忆和计算能力复杂和高级。AI回应人类时的语言哪怕再像一个真人，它也仅仅是对海量人类对话的成功模仿，并不理解对话的意图。我们都知道，对话是有语境，其背后有要指涉和服务的真实活动。举例来说，革命共产国际的Daniel Morley同志在题为《AI会具有意识吗？》的演讲中提到

了这样一个例子：BBC在节目《The Joy of AI》里问AI多久没玩游戏了，它说20年。更有趣的是，AI 随后还主动介绍了《Gran Turismo Sport》，而主持人指出：人类听到别人20年没玩游戏，通常会明白对方并不是真的想听游戏的最新消息。

而这更加说明AI没有真实的情感。事实上，在人类的意识中，情感并不是次要的要素，我们理性服务于它。而情感的基本动力，仍旧唯物地来自血肉物质构成的人类同一整个物质世界的交互，折射出物种的生存、延续、发展的需求。人类为了生存去冒险用石器捕猎，将族群进一步社会化成部落，又或是和同工厂的人一起组织一场罢工，在闲来没事的时候从事去写诗或仰望星空。但这些AI都不会去做，因为它不具备形成这种情感意识的物质基础。这些和人的社会性生存息息相关的情感和活动，都说明体现出意识并不是单纯的计算或记忆能力，它也并非个体性的。

即使去想象遥远的未来，哪怕机器人产业真的发展成熟全面，自动化工厂、挖掘已经普及，人工智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加在一起使得AI这种机器确实可能实现自主地维护和生产自身。但这个机械性过程，也不过是和最新款扫地机器人能自己清理水箱和拖布一样的性质。我们所能预测到的AI自主性的最高点，也仅仅是如上的机械水平。当人类不提供新技术，只能吸收人类知识的AI，除了将自身维护在现有技术水平外，是无法推进自身的硬件演进的。而延展开去说而问题又来了，当人类创造新技术时，为AI服务还是社会需求是基本的推动力？显然是后者，哪怕在资本主义下它是以高度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从适应物质世界的的角度来说，哪怕是最简单的生命体，都比AI这种机器要高级太多：生命会利用最自然界最廉价或者部分有限的资源，自己主动获取能量和制造物质，尝试一切途径不惜一切手段繁殖下去。仅仅是拿病毒这种处在生物和非生物边界的存在来举例，为了适应物质环境、利用宿主进行繁殖，病毒种群的演化速度可以相当快，做到一天变异成百上千次。对物质环境的基础适应性是物种演进的基础能力，AI连此都无法具备，又如何能拥有基于适应能力发展得更为高级的物种的意识能力呢？

顺着这一点去讲，认为一个完全由机器AI平稳运转的“赛博朋克”未来也是荒谬的。这样的想法包含这这么一个前提——

这个世界是静止的，我们的经验已经覆盖了一切问题，这是唯心的，经验主义的。可事实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庞大丰富的物质世界远远大于人类一切的经验，它是相互联系着的，运动着的，改变着的，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和意外正变化着，如果“变化”是圣经旧约里逃出埃及时的追兵和汹涌的红海，那么AI只能捧着过去的经验叹息，只有人类有这个神力能够劈开大海，开拓新道路的只有人类。

皇汉从何而来：资本主义重建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衰

洪专

近两年来，许多中国的左派都注意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在复杂混乱的民族主义思想之中，以“皇汉”为首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尤其引起了左翼的警惕，使得不少后者开始严肃思考：我们是否正在目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无可否认的是，呈现于互联网上的此类民族主义表达大多都是极其反动的，乍看之下皇汉之流的言论仿佛颇为常见。但是，仅仅基于这些看似可怕的表象就直接得出悲观结论，这种方法并不是科学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对这一趋势进行认真和理性的分析，准确地了解它们的内涵和实际影响力，识别出其成因和根源，从而制定根除这种反动现象的斗争方法。

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和过去有何不同？

就作为一种一般性现象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要辩证地了解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所代表的具体内容。

现代的民族主义并非“自古以来”就有。事实上，各个国家内**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都是与本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辅相

成。民族主义一方面可以方便意图掌权的资产阶级在反对旧制度或外族压迫时动员群众，一方面为正在或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提供合法性，并帮助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不过，这种一般性的阐述还并不足以解释民族主义在各地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率先兴起并扩散。但是其他地区则是被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入、以及而后的侵略和殖民行为带进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在这个情况下，过去曾经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例如中国，如果要形成一个真正摆脱列强支配的主权国家，恰恰不能指望已完全臣服于外国列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民族解放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不可避免需要靠工人阶级带领广大劳苦大众来完成。

但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斗争也就必然同时冲撞资本主义本身。在中国，民国革命的迅速破产就让许多解放斗士理解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一般都是从民族解放的思想出发的那批意识最先进的中国革命斗士，都在后来逐渐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诚然，也正是1949年那场废除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才真的完成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任务。

但当前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强的帝国主义力量，早就不再弱小。今日中国互联网上的许多民族主义趋势，不仅没有了过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经常连带的那种国际主义关怀、同情同属被欺凌之列的别族劳苦大众，反而愈发多地强调着自我至上、欺凌弱小。那么，为何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是这种具体形态，甚至发展出了“皇汉”这种极端右翼的种族主义思想？

事实上，这都与中国自改革开放重建资本主义后的整体社会演变、以及自2020年以来全球帝国主义秩序的改变紧密相连。若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那么任何的解读都必然会是片面的，且一定会得出偏离事实的结论。

1980-2000年代：
资本主义的重建，自由派的兴起以及各方对它的反应

中国民族主义在近十年的兴盛，其实是在回应它于前一个时期的相对低迷，那也正是资本主义逐渐在中国被重建起来的时期。考察这一低迷期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中国民族主义在近年回应它时的具体立场和形式。

1970年代末期，由内部官僚弊端、贪腐和错误计划的累积，各个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的计划经济都纷纷陷入严重停滞，中国也在此列。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预测到：一个计划经济如果迟迟没有获得工人民主以及世界革命的重启，那它就会面临反革命的威胁，或是官僚自己走向重建资本主义。

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没有任何意愿在中国实施工人民主或推进无产阶级国际革命，他们反而不断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开始采取向市场经济退让的措施来振兴经济，这也一步步在中国重建起了资本主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特权阶层出身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改革派官僚，构成了所谓自由派的主要部分。一方面，他们希望自由市场和资产阶级民主来得更加迅速一些，因此有别于在市场道路上谨慎摸索的邓小平等官僚。但另一方面，他们当时尚且没有胆量与中共和其所基于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叫板。在这种条件下，自由派为了正当化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立场——想必也是出于他们对西方的狂热崇拜——创造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贬低本民族的本质主义立场。

由部分自由派官僚主导制作、在1988年首播的节目《河殇》是最能概括此时中国自由派思想的宣传之一。其核心可以简要概括为：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河流文明”有着先天的“劣根性”，自然会带来威权主义、落后、愚昧等保守品质，而作为“海洋文明”的西方文明则天生“先进”，其“先进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制度。

这一思想现在看来无疑是十分荒唐且愚昧的，但对于当时的自由派来说，他们终于可以在一种民族本质主义中找到了依据来正

当化立刻贯彻落实资本主义反革命：拥抱“先进的”西方民主和市场制度才是中国摆脱其根本问题的方法。1991年，Then-yu Lau和Yuet-keung Lo 就《河殇》专门写就的论文指出：

> “这部纪录片倡导‘全面采纳西方思想 ’和‘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 ’，引起了党内领导人的不满。 ”

这种言论显然不止会让中共不满，对普通劳苦大众而言，必然也是相当难以接受。

之后，以柴玲等自由派学生领袖所领导的六四事件被镇压后，中共当局加大镇压自由派势力。群众斗争受到重创，短期内不大可能重启。加之自由派领导声名扫地，其势力也被镇压。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后面的一整个时期内都没有给自由派提供误导或劫骑群众运动的可乘之机。于是他们便只能更加变本加厉地用中华民族本身的所谓“奴性”与“愚昧”指责群众不支持自由派，为自己的尴尬处境找借口。

邓小平南巡彻底推进改开之后，中国资本主义的重建彻底完毕。不过中国的整体国力仍然落后于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各个帝国主义，且仍然在各方面遭到后者的打压。对于中国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来说，这个时期无疑充满了苦涩、无奈、与愤怒的回忆。90年代中国工人斗争的消退，让整个产阶级陷入了疲惫与被动。在本国之内，他们不满于自身的阶级利益遭到了攻击，不满于资本主义重建初期遍地的犯罪、投机倒把与不平等；对于国际事务，他们既对中国接连遭到美帝的挑衅与欺压感到愤恨，又对中共对此毫无对策充满怨言。

与此同时，对为什么需要放弃工人国家重建资本主义，中共无法解释。于是它只能在对内政治宣传上越发仰赖民族主义来为自己提供掌握政权的合法性，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与社会主义毫无干系的反动口号标榜为官僚的核心任务。而在当时，反对资本主义重建的“老左派”知识分子，因为不理解只有国际革命和工人民主才能拯救计划经济、避免中国重回资本主义，导致他们无法提供替代市场的政治革命方案，自然也无法解释出路何在。于是老左派们也只能接受新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光复旧物”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空洞民族主义叙事，不能以具体的阶级纲领来为代表旧制度的毛泽东作辩护。

然而，民族主义本身所鼓吹的乃是本民族的强大，但强大终究还是需要事实来证明。

对中国的无产阶级而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尽管此时对中共乃至中国本身都十分失望，他们也并不准备同自由派一般向美西方帝国主义投降。这点从美帝轰炸南联盟、南海撞机事件之后工人的普遍怒火，再到911事件发生时那种“终于轮到美帝吃亏”的喜悦情绪中可见一斑。

与其相对的是，正是因为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与其整体相对弱势的国际地位仍然存在，“河殇论”在当时貌似仍无法被证伪。自由派也因此仍然高度活跃在中国的公共媒体报刊以及知识分子圈层内，并有着很高的影响力，连同当时的客观政治经济因素一并阻碍着中共所推动的民族主义兴起。

哪怕此时中国无产阶级愿意接受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中国社会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也无法使前者有足够的底气去拥护民族主义，并以此去反驳自由派的论调。但无论如何，中国劳苦大众这种对于帝国主义本能的阶级仇恨传统，是无法与自由派之于西方的吮痈舐痔信条相兼容。这种矛盾也为下一个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在群众中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2010年代中期到2022：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衰落

早在2012年，中共就借着钓鱼岛、黄岩岛的领土争端，开始加强煽动群众中的排外情绪并为其政权争取支持。这些煽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是未能彻底在舆论中压倒自由派的声势。

中共的民族主义叙事同自由派的对抗格局，在2010年代中后期终于得到了逆转。此时，中国靠着大规模举债挺过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且其中对基建和工业的投入开始初有成效，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摆脱了对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加工贸易的依赖，开始转向采用中高技术的复杂工业产品的制造与出口，并逐步增强了资本输出。这一切使得其国内经济表现与生活质量得到肉眼可见的提升。中共在2013年提出的、旨在扩大中国

商品和资本输出、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带一路”计划，及2015年提出的、旨在推动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为强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便都是基于这些经济成就，体现出2010年代中期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提升，其野心也随之扩大。

而在同一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则普遍开始陷入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2008年经济危机使得许多西方主要国家遭到重创，他们因此转向或加强了紧缩政策，导致了本国工人阶级对执行这些紧缩攻击的建制派政客的愤恨增加，以及对改良社会问题的愿望增强。然后从2016年左右开始，西方传统建制派政客不得民心，改良主义者（例如美国的桑德斯）屡屡失利，这又给右翼民粹主义的开始抬头提供了条件。特朗普2016年末的第一次当选就是此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其第一届任期内乱象频出，也使得许多中国群众开始认真审视自由派所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合理性。西方政界内的混乱进程标志着这些传统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不似往日稳固，尤其是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洋相更是意味着其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开始走下坡路。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官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开始了极其猛烈的民族主义宣传攻势，并以此为“维稳”铺平道路：即加大扫荡一切国内反对中共势力。因此，除了一如既往地赞扬中华民族的崛起与自身对所谓“领土完整”（尤其是针对台湾）的坚持，中共的这种民族主义还和三种具体的否定紧密绑定在一起：否定中国自由派的亲西方宣传、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及否定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从中共的宣传论调中切实体会到了畅快的“扬眉吐气”：现在的中国终于可以不被西方国家欺负、中国的劳苦大众终于可以不会在被中国自由派贬低时哑口无言。自此，自由派的民族劣根性论调开始在中国舆论中被边缘化。而中共也有意识地利用了中国自由派普遍极端亲西方的特性，调动群众发起对包括自由派在内的“反华势力”或是“境外势力”的敌意和攻击。

随着自由派声势逐渐被压倒，左翼力量事实上也在中国的舆论中得到了复苏。然而，中国舆论场主流左翼中的很多人仍旧把中共专制政府视作非资本主义的、乃至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只是遭到了“走资派”或“资本势力”的腐蚀和威胁。在这种认识下，他们认为中国相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崛起仍然是进步的，或至少是“小恶”。中共为了加强自身在无产阶级中的吸引力，合法化自己的当权，事实上也在帮这种“左翼”论调煽风点火，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标榜成“非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因此，在舆论中开始广泛传播的左翼趋势部分开始同成功推销到群众中去了的民族主义合流。当然，中共所标榜自身的这种“社会主义”，其实抽离、扭曲了一切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备的特征。

在2019年到2022年期间，中共鼓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了高峰。此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为中共进一步证实了其民族主义论调的“正确性”提供了便利。2019年中美贸易战白热化，进一步加强了许多中国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敌视。同年香港的民主运动最终被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劫持，直接导致了许多中国群众将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派直接邀请西方干涉、意图分裂中国这两点联系到了一起。在紧随其后的新冠疫情初期，中国防控的相对成功和西方政府的无能形成鲜明反差，也让许多群众认为本国威权制度相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已然得到了证明。

在这一时期的条件下，作为“皇汉”之前最突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入关学”便顺应诞生。其在内核上仍是中共官宣的逻辑，即认为中国的整体国力、国际地位、乃至制度优越性已然超越了西方。基于此“入关学”甚至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应当放弃以和平手段换取西方国家的认可与接纳，反而应当借助军事力量击垮当今的西方制度，取代美国，并以中国为中心去树立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其中，有些人甚至把这种帝国主义主张形容成“输出革命战争”，给予其“左翼”的外衣。

“入关学”兴盛时，中共对其持相当纵容的态度，并在国内以所谓的“战狼外交”来反哺这一趋势。但是中共放任“入关”思潮肆意猖獗，结果却适得其反。当“入关学”的追随者们不断抬高中共的帝国主义实力与“历史使命”，但最终意识到中共其实无法实现那些不切实际的民族主义狂野幻想时，这些人甚至会将不满指向“背叛”这一期待的中共官僚本身。

2022年到2025年：陷入迷茫的民族主义

中共那套民族主义在群众中的由盛转衰，可以说是起于疫情中期。

最先让民族主义最强硬的支持者受到打击的，是美国时任众议长佩罗西于2022年8月的访台事件。在中美高度摩擦的背景下，中共当局一开始对佩罗西的访台计划展现了相当强硬的态度，外交渠道不断放出“严重后果”、“美方付出代价”等威胁。在沸腾到顶点的民族主义情绪渲染之下，许多中国群众认为这种强硬辞令是在暗示：中国将会与美国和台湾发生武装冲突乃至彻底开战。不少支持“入关”的民族主义分子则摩拳擦掌，以为中美决战即将到来。

然而，当佩罗西专机落地之后，中共对此除了强烈谴责外毫无作为。击落专机、与美国开战的民族主义狂想并没有发生。诚然，从中共的利益角度而言，贸然与美国开战的代价还是太大了。但这仍然在对民族主义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既是中共巨大的“背叛”，也是“入关梦”的破灭。中共最终被自己辛苦培植的民族主义趋势反咬一口。出于对群众愤怒的忌惮，在专机落地之后，中共立刻封锁了微博等社交媒体一夜之久。哪怕之后中国对台湾进行了高强度的军演来找补面子也无济于事。

同样在2022年，曾经帮助维持中共政权的“动态清零”政策也转向了它的反面。加强的封锁政策重创了中国的经济与制造业，政府负债率也不断上升，许多地方政府濒临或是宣告破产。无产阶级更是深受其害，在经济和心理上都饱受煎熬。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清零政策在应对疫情发展上的不现实，劳苦大众想要恢复稳定生活的诉求愈发与中共不切实际的疫情方针相冲突。加之封控期间种种社会乱象丛生，导致中共的公信力大幅度降低。而这种群众过去对中共的盲信，正是前一时期民族主义趋势泛滥的社会基础之一。

疫情期间和之后的几年，绝对体现出了“数年的改变在数月中发生”的那种意识剧变。中国青年和学生恐怕是意识上最受冲击的群体。许多学生不仅在三年疫情期间完全没有体验到正常的校园与社交生活（甚至一些学生高中三年是完全在隔离中度过的），哪怕是在毕业之后，面对的也是完全灰暗的前景：经济持续低迷、解封遥遥无期、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看不到中共所许诺的民族复兴，也看不到经历过改开的父辈所许诺的光明未来。前一个时期，青少年中“小粉红”盛行。但现在这个原本最容易认同民族主义的群体迅速且普遍倒向了反建制、反威权的立场。其中一部分甚至对资本主义也不再有信心，因此也不会再为民族主义所编织的图景买账。

紧密和中共宣传绑定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事实上自从202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先前的肥沃土壤。民族主义意识固然依旧存在，**但是先前可能接受甚至鼓吹它的众多社会底层人士已经在具体的工人和社会斗争爆发后——以及深深体验到经济放缓对工人和年轻人的巨大压力后——将其放置一旁**。

2022年底的反封控运动让群众的意识快速向着各种方向发展。郑州富士康工人罢工的成功不仅使得中国群众意识到中共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也就此点燃了疫情后持续两年多的罢工运动与群众运动接连爆发的时期，该时期一直持续到2025年中的江油事件才开始逐渐平息（虽然罢工仍然在零星持续）。在白纸运动之后，越来越多青年也终于有机会开始接触到各种激进的政治表达，其中部分就转向了共产主义思想，他们成为了当今更有组织的各式左翼刊物和团体的基础。更加自发但是普遍反资本主义的情绪也在无产阶级中弥漫，并时不时得到集体性的表达，使得工人普遍对民族主义思想更加免疫。自由派甚至也短暂地得到了复苏，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各种境外宣传机关的断供，和西方声援巴勒斯坦运动期间“民主政权”对各国抗议屠杀的群众的镇压，则迅速让他们再次失去了受众。

皇汉的登场

当然，中国依旧存在一小部分人：他们在反对自由派叙事的同时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不满于上述中共民族主义宣传中的种种矛盾、“背叛”、与破产，但与此同时这种反中共意识却没有受到2022年开始的各种社会性运动的正面影响，并因此转向了某种更加纯粹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就产生了今天人们所谓的“皇汉”群体。

如果我们抛去那些古怪的阴谋论，将皇汉流派内可以算作是政治性的不满概括下来，其内容无非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文明因为满洲女真人的征服与压迫而陷入衰落、汉人时至今日也遭到“满遗”的压迫、而中共也在通过其“优待少数民族”的“民族团结政策”继续压迫汉人。

皇汉前身的缘起，是基于一小部分人对当今中共少民政策的反对和对少数民族的敌意和歧视，进而演进为对中共民族主义历史叙述的反对。中共为了合法化自己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其民族主义史观强调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因此自然将清朝的合法性包括在内，并将中国近代的衰落归咎于列强入侵，即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但皇汉认为衰落的起点在于清朝开始统治，是民族甚至种族之间的冲突和优劣。因而皇汉在今日反对中共少民政策，反过来要求对汉族至上地位的承认和对少民的打压。

反驳这种荒谬主张并不是本文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都可以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的兴衰做最基本的解释。而了解任何中国现状的人也应该都能意识到，中国的少民工人不仅和汉族工人一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还在额外受到中共民族融合政策下的民族压迫。

至于所谓“少数民族优待”的说法——比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计划生育相对宽松、对少数民族从宽的司法政策——这种牢骚在皇汉蔓延之前其实已经零星存在很久了，只是从未成为主流。不仅如此，就资本主义重建在各民族间制造出的不平等来说，这些政策根本是杯水车薪，只不过是中共企图敷衍少民的作秀。

至于那些更加荒谬的，皇汉基于神秘学、谐音梗、和纯粹想象力所发明出的“伪史”，则更加不值一提——它们已经成为了许多群众茶余饭后的笑料。

然而，今日皇汉兴起的基础是很直接明了的。其得以兴起的时间点，恰恰是前一时期中国激进社会运动暂时的退潮前后。这也就是为什么皇汉分子看似完全没有受到上述社会运动对意识的激进影响。固然有一部分人完全不知道中国有罢工，甚至不知道白纸运动及其具体影响。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暂时性的上涨陷入了停滞。

自从2025年底四川江油群众斗争后，中国目前还没有发生过下一场大规模的自发激进群众运动。中国的罢工也在一段时间的上涨后陷入停滞，虽然现在仍然能够偶尔看到罢工与劳资纠纷，但罢工的规模、组织性、和斗争性却还没有进一步的质的提升。危机的压力落在无产阶级的身上，但群众又看不到一种革命性的广泛工人运动，面对无望彻底改变当下现状的局面，部分群众是会在原子化孤立的情况下，走向一种必须捍卫自身既得利益的零和博弈心态。

皇汉的种种逻辑事实上也和上述提到的一样，将他们所遭受到的生活质量的下降归咎为“少民优待”或是历史上的“民族冲突”。这一现象与西方近期被资产阶级煽动起来的种族主义趋势类似：都是在右翼分子煽动下，无产阶级将自身的困境错误归咎到少数群体身上而非阶级矛盾之上，进而导致本阶级被分化。在过去一整个时期，严肃且正确的左翼思想在中国主流舆论中的缺位，无疑这一现象未能被解释和纠正的原因。

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与群众意识?

在认真考察了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与转变之后，我们可以如下结论：

首先，**皇汉的出现并不代表无产阶级整体正在加速沿着民族主义持续右转，反而是中国民族主义趋势在广大无产阶级中开始失去吸引力、反建制情绪增长的进程中所产出的畸变**。所谓“天欲其亡，必令其狂”的道理，用在此处是十分恰当的。

其次，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生活会教导你一切”。意识首先是在事件的鞭策下发展的。中国民族主义在无产阶级之中失去基础的先决条件，是导致群众无法像前一时期一样生活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群众运动的飞速、跳跃式发展。固然，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先锋队，这一发展不会从自发转向自觉的革命结论。但同样不互斥的是，**群众普遍反建制的甚至是向左的意识转变和激进化，首先是客观条件所驱使的结果，而不是某种人为灌输的结果**。

就比如，一般人今天早已不再听信中共官方的民族主义前几年的那种进攻型宣传。暂时还容忍中共，也大多是基于一种比烂心理——毕竟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确实还没西方那样深重。今年年初一时爆火、并短暂得到中共支持的网红“牢A”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其暂时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直接宣扬祖国的好，反而是通过一种近乎猎奇的、对美国人民在紧缩政策和低社会保障下的悲惨生活的描述，来起到侧面衬托中国社会优越的效果。但是许多中国劳苦大众早在25年初的小红书“中外对账”时就得以一窥国外工人们的真实处境与意识，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反应并非是某种沙文主义式的得意或是落井下石，反而是一种朴素的国际主义共情。这些现象便是意识转变的体现。

同理，今日革命者的任务应该是为中国无产阶级意识在下一批运动中的飞跃做足准备，也就是在此之前就加紧建设革命党的力量，把社会中最先进的力量组织进其中，而不是将其稀释进某种“开化民智”的抽象使命中去——不要忘记，这一错误也是自由派在处理它和群众关系时最致命的问题，他们机械地轻视和贬低群众的意识发展进程。

最后，皇汉或是比如“入关学”等近期出现过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不应该被视作某种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这不是一个服务于垄断金融资本、在线下旨在以烧杀掳掠等方式暴力粉碎工人阶级运动及其组织的、由右翼小资产阶级和浪人无产阶级组成的反动群众运动，而是仅存在于互联网角落内的虚空思潮。

皇汉思想本身确实带有许多反动要素，乍一看也许与人们眼中代表法西斯思想的种族主义颇为相似。但我们要从辩证唯物的阶级斗争角度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核心不是种族主义，而是为垄断金融资本服务来粉碎击垮工人运动和组织。

可是哪怕皇汉本身的一些潮流真的发展为法西斯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定要分清楚法西斯主义思想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持有法西斯思想的零星反动分子无时无刻都存在，但作为一股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而存在、被统治阶级动员起来摧毁无产阶级运动和组织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则又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警惕法西斯运动，是因为我们要仔细分析具体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和他们的性质，找到击倒他们、捍卫工人斗争的方法，而不是因为我们要警惕每一个持有法西斯观念但其实对运动无足轻重的反动个人。

让我们回顾本刊以前提到的关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定义：

> “当资本主义危机深化，阶级斗争达到革命性的高度却无法夺权，而军警、媒体甚至波拿巴主义独裁等资产阶级国家‘常规’手段也无法为统治阶级击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时，统治阶级就有可能诉诸危机中绝望、愤怒的小资产阶级和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浪人无产者的群众运动，以粉碎无产阶级的运动、组织和领导层。取消言论自由、结社权、选举权等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是其反动中的一环。”

当前的皇汉分子在中国的人口占比中是少数中的少数。它们没有任何的组织，没有明确的领导、纲领、与方针，没有线下组织甚至是任何大规模的集会。它们敌视的是一个最为抽象的、被虚构出来的敌人（哪怕是皇汉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敌视，目前也没有被大规模转化为对少民的攻击或是暴行），而不是具体的工人运动或是整个工人阶级。

此外，中国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当前还有着充分的镇压群众运动的力量储备。在当前条件下，如果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真的需要粉碎工人运动，它们完全没有动员起皇汉分子这点蛆虫的必要。更何况，中共将皇汉视为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一种不安定因素，而皇汉对中共的看法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皇汉分子完全缺乏被组织成一股法西斯性质社会力量的关键物质基础——即统治阶级的扶植。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各个阶级的立场都逐渐与自身利益对齐的当下，皇汉分子没有任何能够回应无产阶级诉求的纲领——这也就是为何这种思想最终只是一种流氓思想。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无产阶级，且这一无产阶级尚未被打败。恰恰相反，它甚至还没有认真地动员起自身来！目前中国的革命斗争还没有到来，甚至前革命时期都还不在今日的日程上。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一代中国无产阶级向左激进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如果无产阶级继续尝试发展自身的斗争、且如果革命党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进程中去，那么我们就会更直观地看到当前向左激进化的人数和力量，会是远强于向右激进化的趋势的。

对待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不仅要求革命者保持对反动力量的客观准确衡量，更要求我们保持对自身分析方法的科学把握和应用。因为将一切右翼现象都粗暴地归纳为“法西斯”的后果只会是削弱斗争。在此值得再次指出我们先前的观点：

> “如果中国革命者误读了当前局势，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胜利或是迫在眉睫——这在现在的条件下无疑意味着中国工人运动将面临一整个时期的反动和退潮——那就极易对工人阶级丧失信心，并犯下三种错误：（1）灰心丧气，陷入消沉；（2）在绝望中寻求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政治趋势结盟‘反对法西斯’，陷入机会主义；（3）责备无产阶级群众‘落后’，寻找不存在的‘捷径’，陷入极左宗派主义。”

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真心是因为想要促成阶级斗争的胜利而把皇汉分子视为敌人，那么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来准备条件：一个革命党。归根到底，偏见、歧视和民族仇恨只能通过阶级斗争中有机形成的阶级团结来消灭，而造成无产阶级一切痛苦和分裂的元凶——也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只能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力量来消灭。

转载：黄仁勋的回归

Niklas Albin Svensson 转载自《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暂别11天后，黄仁勋（Jensen Huang）重新坐回了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的宝座。会下金蛋的鹅回来了，股市一片欢腾。短短一小时内，标普500指数的市值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6年11月23日。）

我们上周四才剖析了黄仁勋被赶下台的原因，现在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预判了。

昨晚，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面对全国》节目对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的专访，就已透露出风向有变。上周，他还在带头围攻英伟达及其前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声称英伟达需要到公司外部物色接班人；而在这次专访中，贝森特却“澄清”了自己的说法：

> “我是说过他们应该到外面找人，可他〔黄仁勋〕现在就在外面嘛。”

这句话堪称史上最荒唐的言论之一，足以载入史册。

接着，今天上午，英伟达董事会全票通过让黄仁勋回归，而上周董事会还声称黄仁勋绝无回来的可能。

英伟达董事会现在声称，政府“高层”告诉他们黄仁勋并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这下可真让人放心了。难道要我们相信，他们在11天内就完成了调查、查明了真相？当然不是。

那么，中国问题哪儿去了？特朗普（Donald Trump）说，他就此事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很长的谈话。至于谈了什么，他自然秘而不宣。难道他问了习近平黄仁勋是不是间谍？很难想象这样的谈话能谈出什么名堂。

真正的原因看来与黄仁勋被撤职后标普500指数下跌11%、今年以来的涨幅几乎被悉数抹去大有关系。上周五是最惨烈的一个交易日。英伟达自身虽然蒸发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市值，但问题远不止英伟达一家。

市场真正担心的是什么？特朗普宣称黄仁勋是个天才。此人无论作为工程师还是企业领导人，确实都有些才干。但能干的工程师和领导人并不只他一个。真正让他无可替代的，是他那种看似能凭空变出钱来、让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源源不断的神奇本领。

他们真正担心的，是黄仁勋的离开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他们所谓的“AI交易”，即对人工智能行业未来利润的投机，就此瓦解。而由于拉动美国经济的正是人工智能行业，受影响的将是所有公司，而不只是英伟达。

显然，特朗普及其政府不想在自己任内再添一场灾难，于是认定黄仁勋必须回来。特朗普亲自参加了英伟达董事会的一次会议，力挺黄仁勋复职。白宫甚至还为此邀功：

> “特朗普总统全程参与其中，英伟达董事会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英伟达董事会大概也乐得顺水推舟，黄仁勋于是乎就复职了。

有人或许会问，“自由市场”和“企业自由”哪儿去了？企业不是理应自主经营的吗？现实当然是，在英伟达身上有利益的是美国统治阶级，而不仅仅是公司董事会。统治阶级中最富有的代表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上周就已把这一点摆到了明面上。垄断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盘根错节，远比它们表面上装出来的要深得多。

眼下，人人都在欢呼，市场与英伟达打得火热，标普500指数涨了3万亿美元。这一切恰恰说明局势是何等岌岌可危、反复无常。这能解决人工智能行业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吗？当然不能。特朗普唯一做到的，不过是把算总账的日子往后推罢了。

这就像派对快散场时，酒似乎已经喝光了，大家开始想着怎么回家，想着第二天早上宿醉醒来的滋味，想想就不好受。就在这时，有人洗劫了附近的酒铺赶来，全场顿时欢声雷动。

派对又开起来了，但也开不了多久的。

转载：黄仁勋的兴衰

Niklas Albin Svensson 转载自《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一个星期以来，黄仁勋（Jensen Huang）辞职的消息占据了新闻头条。人们担心人工智能泡沫即将破裂，股市因此陷入一片混乱。整件事散发着企业利益、游说和地缘政治交织的肮脏气味。（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6年11月19日，而后英伟达董事会于同月23日宣布重新任命黄仁勋为执行长。）

有钱有势者的婚外情算不上什么新闻，但这一桩已经让人付出了1万亿美元的代价。人们常说，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可从英伟达股价的跌幅来看，市场显然给黄先生开出了1万亿美元的身价。人们不禁要问，这个人凭什么这么值钱。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黄仁勋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一样，都是那种很难同自己所在的公司分开来看的人。黄仁勋是英伟达的三位联合创始人之一，在公司33年的历史中一直担任首席执行官。所以，他的离去自然会惹出一些风波，但受到影响的不只是英伟达。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的股价大幅下跌，芯片代工商台积电也不例外，尽管后者报告营收增长了60%。就连英伟达的竞争对手AMD，股价自宣布以来也下跌了。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不是一家公司寻常的新老交替。

扳倒黄仁勋的阴谋

过去几天里，事情已经很清楚：黄仁勋是被白宫里的某些人扳倒的。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就是推动此事的人之一。正是他写了一份针对这位英伟达首席执行官的简报，把他同超速国际（Megaspeed）前首席执行官黄乐（二人并无亲属关系）的婚外情，渲染成国家安全风险。

很明显，黄乐（Alice Huang）同中国有着种种联系。通过她，中国拿到了本不该拿到的芯片。至于她是不是真的间谍，那就只能听鲁比奥一面之词了。黄仁勋的另一个对头是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他公开反对这位英伟达前首席执行官，也反对英伟达同中国的各种商业交易。

另一边则是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和特朗普本人，他们显然同黄仁勋更为亲近。特朗普甚至暗示，如果黄仁勋官复原职，他会很高兴。

这背后是什么？是什么让这桩风流韵事变成了一出价值万亿美元的大戏？首先显而易见的是，英伟达对中国企业规避美国贸易制裁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卖给黄乐原先所在公司超速国际、本应在新加坡使用的芯片，最终出现在了上海的一个数据中心里。超速国际把其中一些芯片（连同序列号）拿去在中国抵押贷款之后，这一点就暴露无遗了。

人们还发现，卢特尼克和特朗普已经有一年没有更新空壳公司黑名单了。也就是说，英伟达被禁止向去年那批空壳公司出售芯片，但此后新成立的那些，基本上都可以随便卖。

黄仁勋也毫不掩饰自己反对出口禁令。当然，英伟达想把芯片卖给自己的客户，不想让自己的市场受到任意的限制。他还主张，让中国继续依赖美国技术，而不是让它发展自己的技术，对美国更有利。

诚然，对于一家可能失去20%市场、还可能在世界市场上多出一个中国竞争对手的公司来说，它的首席执行官提出这种论点再方便不过了。再加上承诺分出25%的销售收入，黄仁勋成功说服特朗普，允许有限度地出口H200芯片。这款芯片虽不是顶级产品，性能依然强大。

对超速国际和英伟达的指控是，除了一批低端芯片之外，它们还向中国出口了Blackwell 芯片，而这是明令禁止的。但现在在上海查出的芯片是H800、H200和H100这几款理论上这些芯片本可以合法出口到中国，可是这又似乎不太可能，因为H800和H100在2023年就已被禁，而超速国际并没有H200的许可证。

不管以前那些芯片出口合法与否，白宫现在已经断然收紧了对中国的一切出口，包括对新加坡等一些中间国家的出口。英伟达也已承诺停止向中国出口芯片。然而，国会还在叫嚷着要施加更多限制。

民主党人对付中国

对英伟达采取行动，一个可能的导火索是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民主党人急于揭露特朗普是国家安全隐患，并总体上推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他们在鲁比奥身上找到了结盟的可能性，比起特朗普，鲁比奥是美帝国主义主流更可靠的代表。

民主党人兴高采烈地加入了围攻英伟达的大合唱。参议员玛丽亚·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呼吁停止一切芯片出口。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人警告鲁比奥、卢特尼克等人，要保存与对华芯片销售有关的文件。民主党人还要传唤黄仁勋和卢特尼克到参议院出席听证。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也站出来发声，自然是指责特朗普威胁国家安全。

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尤其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人们认为他对中国人过于宽纵。他们把矛头对准他儿子们的公司，声称这家公司从卢特尼克不更新企业黑名单中得了好处。

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对华芯片出口的立法，包括加强出口监督的《人工智能监察法》（AI OVERWATCH Act）、阻止中国自行制造芯片的《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调法案》（MATCH法案）、防止美国设计的芯片被“滥用”的芯片安全法案，以及其他一些加强出口管制执法的措施。

这一切都发生在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斗争之中。美国外交官正在世界各地奔走，试图让盟友签署他们的“硅和平”倡议，这项倡议要求各国设法把中国排除在人工智能芯片和原材料的供应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之外。

鉴于Anthropic和Open AI都受到中国模型竞争的威胁，它们公开支持限制获取英伟达芯片，包括支持民主党人提出的新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仁勋是这一计划的绊脚石。他一直在向特朗普施压，争取出口许可，如今这块绊脚石被搬开了。英伟达新管理层也出了一份力，承诺不再向中国出售H200芯片。

当然，没有人问，美国凭什么有权不让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不让中国获得这种技术似乎就那么刻不容缓，而美国拥有这种技术却没有问题。

我想，从美国资产阶级的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让中国人安分守己，这样他们就不会同我们的公司（比如Anthropic）竞争，也不能把这些新技术用于军事目的。

可别人为什么要在乎，就不那么清楚了。他们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混合战争大肆渲染，其中很多纯属捏造。可当美国用人工智能瞄准伊朗的学童，或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做同样的事时，他们似乎并不生气。同样，我们确切地知道，Anthropic和OpenAI的智能体一直在入侵各种各样的机构。我们却不知道有哪家中国公司干过这样的事。

围剿“开放权重”模型

贝森特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上周宣布，中国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被用来入侵控制法国冰箱的软件，导致许多超市的冰箱过热、食品变质。他宣称这些模型很危险，“因为它们没有护栏”。至于今年7月Hugging Face不得不借助中国模型来抵御OpenAI的爬虫这件事，就只字不提了。

这是这场运动的另一部分。Anthropic、OpenAI等公司正试图垄断人工智能市场，具体说就是大语言模型（LLM）市场。它们起步早，却越来越难以保持领先。训练这些模型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中国人和其他人正在迎头赶上，他们的模型运行成本往往还要低得多。

开放权重模型的另一个优势是，用户可以在自己的硬件或自己的数据中心上运行它们，还能控制它们的参数。对那些担心人工智能“算力”账单越来越高的公司，以及那些不太信得过OpenAI和Anthropic能保护好客户数据的公司来说，这很有吸引力。

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服务器上使用未具名的开放权重模型。大型网上银行Revolut也在炫耀自己使用中国模型的成功。

但这一切对Anthropic和OpenAI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它们需要在今后几年里把收入提高到十倍，才能兑现它们对所谓超大规模云服务商（谷歌、亚马逊、微软、甲骨文和Meta，即建造了运行这些模型的巨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公司）作出的数千亿美元的承诺。

Anthropic和OpenAI的问题，自然也是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问题，因为后者指望着向这两家模型提供商收费，来收回自己数万亿美元的投资。

这整套商业模式，已经在物质资源和金融资源两方面套牢了美国经济的一大块，如今正受到中国模型的威胁。当然，还有军事问题。谁拥有最好的模型来运行自己的军事硬件、搜集情报？说到底，谁拥有最好的资源去入侵、破坏对手的经济？

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统治阶级如今站出来反对中国模型。他们从政府采购下手。美国政府各部门现在只有获得特别豁免，才能运行中国模型。

今年夏天出现了一个引爆点：黄仁勋牵头发起了一封公开信，反对限制开放权重模型。Anthropic拒绝联署，而OpenAI虽然在信上签了名，后来却支持了民主党人的立法，这项立法施加的正是Anthropic夏天所主张的那些限制。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扼杀中国开放权重模型的关键，是限制它们获取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据说，即使这些模型可以在其他

的、中国制造的芯片上运行，训练它们仍然离不开那些芯片。为了做到这一点，黄仁勋就必须走人。

他们为什么想让他回来

如今，半个人工智能行业都在跳着脚要求黄仁勋回来。埃隆·马斯克大多数时候似乎只关心他自己，可这一回，他却带头呼吁让黄仁勋复职。马斯克和他的同谋们以为，他们可以重演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的一幕：奥尔特曼也曾被解雇又被重新聘用（不过，和遭遇同样命运的工人不同，他复职后的待遇和条件并没有变差）。

他们为什么要在乎？在那些说黄仁勋多么了不起、是个天才之类的煽情故事中，人们可以察觉到一种真切的恐惧：人们害怕人工智能融资和投资这座纸牌屋可能会倒塌。

这里不是细说的时候：这个行业里的各家公司彼此之间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和承诺，这个行业同影子银行也有着种种关系。

在这里，关键在于黄仁勋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让英伟达为客户的贷款提供了1160亿美元的担保。他不只给大公司提供这些担保，还给一大批小公司和初创企业提供担保。

这让他很受欢迎，但除此之外，人们还担心，没有了他的威望，没有了直到上周还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的财力支持，整个局面就会轰然倒塌。

这有点像皇帝的新衣。一旦他们开始仔细审视，可能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债务也许，嗯，并没有着落。最擅长靠炒作空手起家建公司的埃隆·马斯克，成了黄仁勋最响亮的支持者，这或许不是偶然。

欧洲央行（ECB）一反常态地抓准了时机，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人工智能市场的风险：

> “即使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技术成功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由信贷推动的人工智能繁荣仍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资本错配，并给投资者造成信贷损失。”

欧洲根本没有人工智能产业，这究竟让欧洲央行更可能还是更不可能说真话，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但不管他们动机如何，他们说的无疑有道理。

OpenAI和Anthropic建立起来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它们能够收取的费用至少是运行一个开放权重模型的两倍。而便宜的模型在能力上只比顶级模型落后几个百分点，这个要求可不低。而且不只是中国模型。微软、谷歌乃至英伟达自己都有能同Anthropic和OpenAI竞争的模型，至少在性价比上如此。

那么，那些押注Anthropic和OpenAI的投资者怎么办？那些凭着这两家公司的承诺、往数据中心里投了数万亿美元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又怎么办？他们只能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

当然，眼下投资者可以安慰自己：英伟达刚刚在三个月里赚了650亿美元利润，这意味着它2026年全年的利润有望达到2100亿美元。作为对比，联合国说，消除世界饥饿每年需要930亿美元。不过，英伟达并没有决定把利润用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也没有决定用来给那些在台湾生产英伟达GPU、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月薪只有650美元的移民工人涨工资。它决定的是用1500亿美元回购股票来收买股东。

资本主义的“最好”表现

有人声称，资本主义能使资源配置臻于完美，能通过看不见的手把资源有效地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恰恰相反。

几十年来，资本家几乎找不到什么能投资的生产性领域，宁愿把钱花在购买艺术品、房地产和比特币上，或者干脆像谷歌和苹果那样囤积数千亿美元的现金。如今，他们突然以为自己找到了会下金蛋的鹅。几十年来，对真正生产力的投资越来越少，如今他们突然找到了似乎能产生利润的东西。

数万亿美元涌入了一个行业，而这个行业的创始人们自己都声称，它是“对人类的生存威胁”（Anthropic的达里奥），或者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完蛋”（OpenAI的奥尔特曼），还会带来一场“白领大屠杀”，使失业率达到20%（达里奥）。

他们以惊人的速度，不顾环境、基础设施乃至整个人类，开始砸下数千亿美元兴建新的数据中心。他们不是合作利用这项技术造福人类，而是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斗争，企图阻止中国获得这项技术。

如今，整座大厦都有轰然倒塌的危险，并把整个世界经济拖入萧条。这个行业的一半人把希望寄托在黄仁勋身上，另一半人则寄托在保护主义上。他们都是在自欺欺人。

大语言模型乃至整个人工智能，有着改善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巨大潜力：它能免除那些平凡、枯燥的行政事务，帮助我们发展科学技术，造出更好的机器人，去完成我们不想让人去做的工作。但在资本家手里，我们得不到这些，得到的反而是通货膨胀、失业和环境破坏。黄仁勋，以及他本人、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所代表的东西，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

阶级斗争专题：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

马克思 1866年8月底

(a) 它们的过去

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议，即使在物质生活数据和劳动数据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继续存在，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

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协议中争取到哪怕是能使他们摆脱纯粹奴隶状态的一些条件。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还存在现代生产方式，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不仅如此，这种活动还应当通过各国工会的建立和联合而普遍地开展

1 本文选自《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批示》。这个批示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大会的代表们们写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日—8日在日内瓦举行。全文共有11节，这里收录的是第六节。

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

(b) 它们的现在

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因此它们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最近看来它们总算是意识到它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它们参加了英国目前的政治运动[2]，更多地理解了它们在美国的作用[3]，以及不久以前在设菲尔德举行的盛大的工联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这次代表会议恰当地估计了国际协会在把各国工人联合为统一的兄弟般的联盟方面的活动，并郑重地建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团体参加这个协会，认为它能真正促进全体劳动者的进步与繁荣。」[4]

2 这里所谈的是英国各工联于1865－1867年间广泛参加争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一般民主运动。

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订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行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某些住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都有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慑于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

3 在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工联积极支持了北部各州与奴隶主斗争；1864年春工联曾起来反对反动的海斯丁斯－福哲尔罢工法案。

4 1866年7月17日至21日英国工联在设菲尔德举行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代表20万个有组织的工人的138位代表。主要问题是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问题，为这个问题曾专门开过几次会。代表会议号召各工联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发表于「1866年7月17日及其后四天于设菲尔德举行的联合王国工联代表会议的报导」1866年设菲尔德版。

(c) 它们的未来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它们承认自己是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因而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应该特别关怀那些报酬最少的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工人，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工会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19—221页

共产主义问答：欧洲福利体系现状如何?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的“福利制度”都承载了太多中国群众的各种遐想，而近期欧洲范围内的群众运动又让这一话题重新进入了许多人的视野。网络上有不少人疑惑：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些欧洲人还在抗议？

对于这一问题，应该采取“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的态度。资本主义的危机本来也就是改良主义的危机，没有经济的持续繁荣，任何福利政策都难以为继。逐一分析所有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紧缩政策会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但是本文可以从北欧这一“福利国家”的典范开始入手，来揭示当今“福利国家”的真相。

比起医疗和教育福利体系，中国群众更羡慕的是北欧的劳动保障制度（加班少、低工时）。中国帝国主义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成因之一就是对本国工人阶级的严重剥削，而这也体现在工时之上——2025年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工作时间达到了48.6小时每周，一度达到历史最高值49.10小时。而这还不包括每天下班后“随时在线“的隐性加班时间。2025年底，一则32岁程序员因长期加班导致猝死的新闻，更让很多群众进一步对国内形同虚设的劳保制度感到失望和愤怒。

与之相比，以瑞典为例的北欧国家，通过1920-1970年的一系列工会斗争所争取到的40小时工作周制度还相对稳定。在70年代工业转型后，北欧很多高强度、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由于人力成本和工时限制，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这也导致很多被国内剥削之重而激进化的工人同胞怀疑说，发达福利国家是将“高压力、长工时”的初级生产环节留给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维持了本国的“高福利、短工时”平衡，从而质疑“富有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否是我们的盟友”。

然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全球性质的体系，全球工人阶级都在经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如今的危机下，这种压迫和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当年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获得的少数福利也无法继续支撑。根据2026年3月欧盟统计局的最新数据，瑞典青年失业率约为24.2%、芬兰青年失业率已升至22.3%，均比欧盟平均失业率15.2%更高——比中国18.9%的青年失业率还要更高。前段时间，瑞典最大的超市ICA还通过减少工人上班的工时以此节省长期用工成本，导致工人们不得不为了“上更多班”而斗争。这和2025年深圳易力声工人罢工以保有“加班权”出自同样的目的。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之下，一个书面上的“40小时工作周”显得十分可笑。

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等其他福利体系，北欧和中国的工人阶级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中国，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医院停止运营。近年来，“欠薪、缓发、社保医保断缴”等问题在一些地区频繁出现，其他公立医院工资减半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在瑞典，2025年起，在索莱夫特奥之类的北部城市，多个功能齐全的急诊医院被关闭，这意味着当地上万居民如果要看急诊，需要到100多公里之外才能就诊。瑞典的人均医院床位数已降至欧盟最低水平。到2025年4月底，瑞典境内至少发生了6次护士罢工，以抗议越来越长的工时和迟迟不涨的工资。

在中国，早在2011年，就有14个省份的养老金入不敷出，全国总缺口达到766.5亿元。根据预测，到2035年，中国的养老金保险可能就会耗尽。与此同时，百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被官僚挪用于非养老用途。而在瑞典，电池企业北伏申请破产后，瑞典多家国家养老基金投出去的钱血本无归，总计约近90亿瑞典克朗的投资已被减记为零。在通货膨胀和食品能源价格的增长下，越来越多的老人只能靠去捡瓶子来寻找额外财源。而北伏的CEO早在公司破产前通过提前套现，从中获利了约2亿瑞典克朗。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现代的工业劳动和资本压迫，无论在北欧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

> “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

由于资本主义下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北欧和中国，和世界上各国的工人所面临的紧缩与压迫都是一致的，而结合以上的事实，所谓“福利国家的工人贵族”这一观点，只能说是充满偏见。而要彻底解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也要靠这些所谓“全球北方”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

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

> “没有改革就没有改良主义，没有繁荣的资本主义就没有改革。”

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北欧国家二战后积累的繁荣已经无法支撑工人曾经用鲜血斗争获得的这些福利，中国来源于工人国家遗留的福利体系也在私有化的冲击中不断缩减。倘若能够很好地理解和解释北欧的情况，便能很清晰地表现出资本主义下改良主义的限制之所在，也进一步能让工人阶级和群众意识到，想要获得真正的福利，想要赢得更少的工时和最完整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和资本主义做最根本的决裂。